

地缘与学缘

一九二〇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

周宁·著 DIYUAN YU XUEYUA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财经大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一九二〇年代的安徽教育界(1920—1926)

周宁·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与学缘:一九二〇年代的安徽教育界/周宁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650-0237-3

I. ①地… II. ①周… III. ①教育史—研究—安徽省
IV. ①G52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6764 号

地缘与学缘:一九二〇年代的安徽教育界

周 宁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特约编辑 章玉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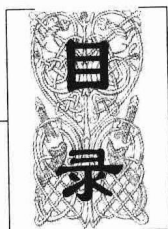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印 张	12.5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198 千字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237-3

定价: 2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MU LU



前 言	(1)
第一章 直皖战争和安徽教育革新运动	(16)
第一节 旅京、旅沪皖事改进会的成立	(17)
第二节 迎拒教育厅长风潮	(22)
第三节 省立学校校长的大规模撤换	(34)
第二章 省教育会改选和学系之争	(50)
第一节 省教育会改造的呼声	(53)
第二节 1921 年省教育会改选的僵局	(62)
第三节 委员制省教育会的成立	(71)
第三章 新学制改革和教育界地方主义之争	(88)
第一节 皖北教育界抗议省立学校设置不公	(88)
第二节 怀宁教育界“倒江”风波	(103)

第三节	五十九县教育界力争义务教育补助费	(115)
第四章	筹办省立安徽大学的努力和纷争	(124)
第一节	经费不足:筹办成为泡影	(124)
第二节	派系纷争:筹办胎死腹中	(135)
第三节	省立安大筹办与教育机会均等之争	(148)
结 语		(158)
参考文献		(166)
附 录		(174)
后 记		(197)

前言

由标题不难看出本书是一个地方教育史的研究。然而，与以往的地方教育史研究不同，笔者更多关注的是教育界的主体——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活动。当然，这并不是说前人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没有注意过这方面的内容，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前人在研究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时，更多强调的是那些明显的新旧之分。正如罗志田在《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中所说：“由于研究者多习见史料中明显的新旧之分，‘不新不旧’的人与事以及新旧各自阵营中表现不那么极端或积极的群体，在我们的研究中多半处于一种‘失语’（voiceless）的状态之中。”^①

在安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情况亦复如此。长期以来，教育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以及与军阀的抗争，一直是研究安徽近代教育史关注的焦点，^② 提倡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也备受研究者青睐，^③ 而一些“不新不旧”，

①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② 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一部以教育界自身活动与发展为主体的安徽近代教育史著作，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夹杂在安徽近现代史、革命史、文化史的内容之中。受这种思维模式和书写框架的影响，诸如五四时期安徽各地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的抵制日货运动，1920年的省立学校革新浪潮，1921年的“六二学潮”等等自然也就难免成为安徽近代教育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参见翁飞等：《安徽近代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戴惠珍等：《安徽现代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安徽省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现代革命史资料长编》第一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海鹏等：《安徽文化史》（下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皖西革命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台湾学者谢国兴在《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1860—1937）》一书中，也专辟一节讨论近代安徽新教育的发展，但受主题所限，加之时间跨度过大，对相关问题也未能进行深入的探讨。参见该书第521—564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4），1991年版。

③ 对辛亥以前的，关注的是以《安徽俗话报》和安徽公学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人物有陈独秀、李光炯、卢仲农、房秩五、吴守一、潘赞华等，侧重点是这些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五四时期，芜湖省立五中被誉为安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刘希平、高语罕、朱蕴山、卢仲农等一批趋新知识分子的活动受到更多关注。此外，尚有安庆枞阳的光明甫、李光炯等人。

但对安徽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或事却遭遇冷落,甚至根本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在这种研究模式支配下,由于主题的趋同、方法的单一和相关资料开拓的不足,许多著作其实是在重复前人的劳动,没有真正的学术累积。^①

当然,笔者无意否认“趋新”领域研究的意义,更不是说在这些领域已经没有了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相反通过新资料的发掘以及视角的转换,我们可能会对这些极为“熟悉”的人或事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认。比如说,安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六·二学潮”,我们以往更多关注的是学潮爆发的过程,就学潮说学潮,较少顾及围绕学潮交涉复杂的省内外互动,以及与省内其他事件的关联。其实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当时的各大报纸,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材料并不鲜见。再比如说,在安徽近代教育史上通常都要提到的1920年省立学校革新浪潮,大批校长被推翻并不仅仅是学生民主意识觉醒的体现,政局的变动、省外学界力量的介入以及学校内部的派系之争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都提示我们对安徽近代教育史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从教育学界的立场出发,或许认为更多的关注教育界活动,忽视教育自身的发展,并非真正的教育史研究。毋庸讳言,由于教育史学科本身的不确定性,史学和教育学出身者,在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教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宏观、较广泛、较注意探寻教育发展规律,因此多教育通史或贯穿古今的专题研究;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较微观、较专精、较注意求证历史事实之真相,因此多做断代教育史或具体问题的研究。”^②不过这也并非绝对的界标,特

① 在安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有的甚至连一些基本的史实都未梳理清楚。比如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倪嗣冲倒台,政局变化引发安徽教育界革新的浪潮,省立学校校长大批被推翻,刘希平、李光炯、光明甫先后继任省立五中、省立一师、法专校长,这本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由于过分强调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加之受一些回忆录的错误引导,在没有认真核对相关材料的情况下,就认为该运动是1919年之事。参见石原皋:《回忆刘希平先生》,收入《安徽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翁飞等:《安徽近代史》,第470—471页;张海鹏等:《安徽文化史》(下卷),第1972—1973页。1919年冬,法专确有推翻校长张铭之事,但与1920年省立学校大规模的革新浪潮并无直接关联,而且继任校长为胡寅旭,并非丁述明。关于此事,笔者在第一章第三节有较为详细交代。

② 刘海峰:《在教育和历史之间》,《教育史研究》2001年第1期。

别是近年来在教育学界的反思^①和历史学界的大规模介入下，这种差异渐有融合之势，在近代中国大学校史的研究领域中更是出现了一批科技整合的代表之作。^②

且抛开人为边界设定的无谓争论，即使是从“纯粹”的教育学角度而言，安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也十分单薄，而且碰到的问题恐怕更多。就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除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篇综括式的论述和文史资料、地方志上陈述式的记载，^③相关的研究几尽阙如。最近立项的安徽民国教育史课题，也基本上停留在事实清理和数字统计的起

① 当下教育学界正日益感到教育史的研究陷入困境之中，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层面反思教育史研究的新思路。大致说来，开始注重与历史背景知识的结合，强调“引文意识”，引入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新方法，成为教育史学界发展的新方向。参见卡特林娅·萨里莫娃主编、方晓东等译：《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欧文·V. 约翰宁迈耶：《教育史的本质、目的和方法》，收入《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第232—249页；刘海峰：《高等教育史研究三探》，《教育史研究》1997年第2期；刘海峰：《大陆的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述评》，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0期；周洪宇：《教育史研究改革抒见》，《教育评论》1991年第2期；刘静：《教育史学的想象力——后现代史学观与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研究》2003年第1期；马立武、常旭：《试论教育史研究中的历史人物问题》，《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金忠明、林炊利：《教育史学科困境及其对策》，《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周恩文：《近二十年大陆教育史研究的量化分析（1978—2003）》，《台湾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9卷第1期。

② 台湾学者苏云峰可谓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其先后出版的三本专著均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参见其《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82），1998年版；《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该书1996年在台湾曾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形式出版）；《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大陆学界也有三部上乘作品相继问世。分别是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1895—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论文（未刊）。尤其是后两部著作视角新颖，方法独特，资料翔实，代表了这一领域更为深层的发展方向。美国学者魏定熙（Tim Weston）对早期北京大学的研究也有相关著作出版。参见魏定熙（Tim Weston）著、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章颢华：《清末安徽新教育》，《安徽教育》1984年第9期；张正元、杨克贵：《安徽高等教育发展概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王鹤鸣：《安徽近代教育发展概述》，《安徽史学》1986年第3期；吴毅安：《清末安徽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特点》，《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沈寂：《安徽新型高等教育的开端》，《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文史资料和地方志中的相关内容很多，不赘。

步阶段，^①一些第一手资料甚至还尚未被相关研究者充分地加以利用。^②不仅如此，而且这种教育史的写法，由于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往往就教育谈教育，忽略教育同社会背景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质疑。

教育史的研究不应当是一堆干枯的数字，或是千篇一律的教育宗旨和教育制度的铺陈与复述。台湾学者吕妙芬在《明清教育史的几点观察》中曾指出：“随着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盛，我们看到许多研究作品实际上是以‘教育’作为一个延伸联系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接口，教育史的研究也因而以更多样的面貌被呈现”，“教育史的研究实无法脱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研究，它的呈现也经常与其他问题意识的结合而不断推陈出新”。^③这的确是教育史学界应该努力的方向，不过就目前而言这样的作品其实并不多见。

笔者有心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模仿和尝试，不过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自身知识储备的不足以及相关资料的缺乏，离预期目标还相差很远。

回到本书主题，先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选题。两年多前入学时，章清师曾提示：近代安徽知识分子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群体，这些知识分子如何走出安徽，走出安徽之后有没有形成聚集，在家乡之外又是如何表达对安徽的关注，以及与省内知识分子的关联如何，一直都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不妨作为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④的确，像陈独秀、胡适、陶行知这样的皖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他们在全国舞台上的活动，即使谈到他们与家乡的往来，也多是在他们没有真正

① 感谢陆发春教授告知这一信息，并提供相关早期研究成果。

② 如《安徽教育月刊》（1918—1924）前后共出61期，为研究安徽近代教育史尤其是五四前后安徽教育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但由于安徽省图书馆和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教育课题组于1987年编辑出版《安徽近代教育沿革与统计资料选辑：1840—1949》时，仅收录了其中极少量内容，以致相关研究者在使用这一资料集时也未能见到这个连续性期刊予以充分的关注。再如《安徽教育杂志》、《安徽教育会季报》、《安徽教育公报》等由于没有收入这部资料集，以致至今还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③ 吕妙芬：《对明清教育史研究的几点观察》，《大学教育科学》2005年第5期。

④ 郝先中在《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中，考察了以陈独秀为核心的皖籍知识分子群体的两次集结过程，但限于篇幅以及文中大量使用的二手资料，仅停留在宏观描述阶段。参见《民国档案》2003年第3期。

走出安徽之前。^①而像王星拱、高一涵、李辛白、程演生、刘文典、邓以蛰、孙洪芬、洪范五、姚文采等这样一批曾经任职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皖籍教授，当他们走出安徽之后，似乎更是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了他们的家乡。

事实真的如此吗？带着这种疑问，笔者开始关注近代安徽知识分子的活动。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这些皖籍知识分子不仅对家乡事务保持着高度的关切，而且与省内教育界精英有着密切的沟通，一些人甚至还一度回皖在教育界供职。如1920年8月，京、沪两地皖籍知识分子发起旅京、旅沪皖事改进会，与省内教育界频繁互动，直接影响了同年秋安徽教育厅长的任命。此后在皖省的“六二学潮”、“废督裁兵”、“反对三届议员贿选”、“教职员索薪”等一系列重要事件中，这两个团体通过媒体也均有意见发表。^②旅外的皖籍知识分子不仅通过团体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家乡关注，有时还以个人的身份与安徽教育界保持紧密的往来。如北大教授王星拱，1921年直接卷入安徽省教育会改选的纠纷，1923受旅京同乡委托和高一涵等人回皖平息安徽教育厅长辞职风波，1925年辞职南下担任安徽省立一中校长，并于次年6月被安徽教育厅长洪述任命为安徽大学筹备处总务股主任。再如胡适，1921年回皖演讲，和陶行知、蔡晓舟等人发起安徽大学期成会，随后又领衔发表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③次年3月还被推选为安徽大学筹备处交际股干事。此

① 这里的“走出安徽”是就影响力而言。比如，辛亥革命前陈独秀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安徽，学界对此已予以充分的关注，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此时陈的影响力也主要局限在安徽。当其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声名鹊起之后，则很少有研究关注他与家乡事务的关联。而对于胡适、陶行知这样通过留学直接进入全国舞台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与家乡交往的研究则更少。

② 哈晓斯在《陈独秀和旅沪皖事改进会》一文中对旅沪皖事改进会的活动有粗略的介绍。参见哈晓斯等：《皖事拾零》，第190—193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郝先中在《五四时期皖籍先进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典型特征》中也提到了旅京和旅沪皖事改进会的成立情况。

③ 哈晓斯也注意到胡适、陶行知、蔡晓舟等人联名发表的《根本改造安徽省教育会宣言》，但其侧重点是表彰宣言中体现的民主意识，而没有注意到宣言发表背后皖省教育界复杂的派系之争。参见《皖事拾零》，第193—195页。

外，北大教授邓以蛰、程演生也先后于1925年回皖担任省立一师校长。^①

关注这些旅外皖籍知识分子的同时，由于较多地注意他们与家乡的关联，以及由此造成的观察重心下移，一大批省内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活动也逐渐进入笔者的视野。其中为人熟知者，如光明甫、李光炯、高语罕、刘希平、卢仲农、朱蕴山、沈子修、王肖山等；^②也有很少被人道及者，如程小苏、赵纶士、刘式庵、徐方汉、丁铭礼、向道成、余幼泉、史毓琨等。^③

在阅读《胡适日记》手稿本的过程中，有两份粘贴的长函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一是油印的《刘希平、卢仲农、汪雨相、高语罕为省教育会改选事致胡适之、陈独秀、李辛白、高一涵、王抚五诸君书》，一是铅印的《安徽高等学堂同学会宣言（为省教育会改选事）》。两份长函均为省教育会会长改选而发。刘希平等人力主李光炯，“高等同学会”拥戴王星拱，彼此互相攻击，当时省内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一些旅外的皖籍学界精英，都卷入其中并各有所属，这引起了笔者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浓厚兴趣，由此也把研究的重心放到了这些知识分子

① 王星拱、邓以蛰、程演生等北大教授于1925年前后纷纷回皖，与北方政局的变动有关。1925、1926年前后因北方政局变动造成的知识分子南下，不少学者已予以足够的关注。参见章清：《亭子间：一群人和他们的文化事业》，第11—1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版；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第71—7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第248—258页，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版；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97—9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但在南下知识分子的落脚点上，强调了上海、广州、厦门这样的大城市，却忽略了他们还可能回归各自的家乡。不过，像安徽这样的省份，由于没有大学吸纳这些南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甘在中等学校长期供职，因而一有机会就纷纷再度北上，或转投他处。当时有报道说1926年安徽大学的再度筹办，与吸纳这些南下的皖籍知识分子有关，实不无道理。

② 其实所谓的熟知，只是熟知他们趋新的一面。如陈万雄先生在《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中，对辛亥和五四时期这些知识分子在安徽的革命和启蒙活动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受主题所限，对他们更为一般的教育活动我们则无从得知。参见该书第81—1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至于一般的近现代史著作，甚至连他们趋新的一面也多是泛泛而谈，更多地集中在他们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活动上。

③ 这些很少被人道及者，在安徽教育界实有重大影响。如程小苏早年创办安徽农业高等学堂，辛亥后和光明甫等人发起江淮大学，五四时期担任六邑中学校长，此后供职安徽教育厅，为安徽教育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刘式庵为留英工科出身，回皖先后担任工专和省立一中校长。徐方汉长期担任省立一女师校长。这些人物除了在文史资料中偶尔提及，在一般的研究著作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在省内教育界的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派系矛盾和冲突上来。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史要义》中有言，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伦理本位亦即关系本位。^① 金耀基也认为，“儒家的社会理论具有一种理论的倾向，要把个人发展成为关系本位的个体”，而“关系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有关个体共有的归属特征”，在众多关系之中，“最具共同性的归属特征就是地域（籍贯）、亲族、同事、同学、结拜兄弟和师生关系。”^②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更是指出，“同窗好友之间的一见如故比简单的共同利害具有更深层的意义。”^③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除了揭示思想上的新旧对立外，安徽教育界总是以一种整体的姿态出现，^④ 似乎最具归属特征的地缘、学缘关系在这里并没有发生丝毫效力。是事实如此，抑或有所遮蔽，基于上文省教育会改选派系冲突的材料，笔者对此不能不持审慎态度。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逐渐发现，就安徽教育界而言，尤其是在五四之后，思想的新旧对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教育界确实存在着许多纷争，但绝大部分纷争都不是以新旧对立的形式出现，^⑤ 而由地缘、学缘关系建构出来的派系和集团往往正是教育界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

① “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把重点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诚然，中国之伦理只看见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间关系。……这就是，不把重点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83—8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② 金耀基：《关系和网络——一个社会学的阐释》，收入氏著《金耀基自选集》，第99—10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著、杨亚平译：《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第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④ 萨利什·钱德拉·格什（Suresh Chandra Ghosh）认为这实际上是用地方的事实去重复阐述已知的国家历史。参见《印度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发展趋势》，收入《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第111页。

⑤ 罗志田曾指出：“在一般认知中的新旧阵营里，通常也还有进一步的新旧之分；而且斗争得最厉害的往往是观念主张相对接近的群体，比如‘新新派’与‘老新派’之争就常常甚于更广义的新旧之争，盖其潜在的追随者大致相近，故竞争也更激烈。”《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这对理解思想界乃至教育界的纷争均有借鉴意义。比如1921年的省教育会改选，抛开幕后派系的矛盾，仅就王星拱、李光炯个人来说，从思想倾向上看两人应均属新派，实可验证新新派和老新派争斗更为激烈之说。

教育界的地缘和学缘关系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话题,时人对此早有切身体会。叶楚伦针对当时大学里的门户之见,就曾专门著文提出批评:“有的因读书地点不同,居然成门户,大一点有什么欧美的日本的,小一点有什么北大的东大的,再从出身的地点说,又濡染了地方色彩,甚至于一省里边也分几个地方的系统。”^①周谷城也感叹:“教育界之党派,近来殆已复杂至不可名言。就留学生之归国服务教育界言,有所谓‘东洋派’、‘西洋派’等等。‘西洋派’中,又有所谓‘英国派’、‘美国派’、‘法国派’等等。就国内学校毕业之教育界人士言,有所谓‘北京派’、‘南京派’等等。就教育界人士出身之母校言,又有所谓某某大学派、某某高师派等等。大之全国,小之一县、一乡镇,凡教育界,无不有党,无不有派。人谓政界腐败,党派分歧,涉足其间者,无不腐化。谁知向所谓清高之教育界,亦已腐败,亦且党派分歧。”^②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现象也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就主题而言,大多仍集中在全国层面和几所著名的大学,^③针对一省的研究还尚未发现。以安徽为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相信不仅有助于了解安徽教育界内部的关系,而且对丰富

① 叶楚伦:《向学界报告几点》,《中央周报》民国二十年新年增刊第16页,转引自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论文(未刊)。

② 周谷城:《教育界之党派观》,《教育杂志》第20卷7号,收入《周谷城教育文集》,第49—55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 如民国初年,以太炎弟子为首的浙人对教育部和北大的把持。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第2—12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魏定熙(Tim Weston)著、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第80—87页。魏定熙在该书中甚至认为浙籍的老乡网为蔡元培任职北大铺平了道路,所起的作用与蔡作为著名教育家的身份一样大。参见该书第124—125页。二三十年代法日派和英美派的争斗也常被学人道及。如鲁迅和顾颉刚的纠葛,参见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0—117页;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如“大学区制”试验的失败以及蒋梦麟与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冲突。参见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1895—1949》,第178—184页;许小青:《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以国家、政党与社会为视角的考察(1919—1937)》,华中师范大学2004级博士论文(未刊)。此外,苏云峰对清华内部的圣约翰派、南开派、北大派以及各地清华校友会复杂的权利斗争进行了深入发掘。

这一领域的认知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致说来,20年代的安徽教育界,地缘上有皖北、皖中、皖南之分,^①学缘上有“龙门”、“两江”、“高等”之别,其形成既有历史因素的长期积淀,也有现实利益的直接推动。

在众多因素之中,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对皖北、皖南等地缘集团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元代以前,历代王朝行政区划,淮河、长江都是重要分界线,但元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开始有意打破这一分界。^②元初的江淮行省即跨越长江两岸,中期的河南江北行省则包有淮河南北。到了明代,情形又有进一步发展。明太祖朱元璋定都金陵,而他的老家又在凤阳,于是洪武元年,他以金陵和凤阳为中心,划出一个包括江北、江南、淮北三个不同区域的大南京。南京后称南直隶,清初改称江南省。康熙年间因感其疆域过大,又纵切一刀将其分成东西两半,东部为江苏,西部为安徽,使苏皖两省都成为地跨江淮两岸的高层政区。^③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使得安徽建省之初内部就存在着地理、经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有清一代这种差异不仅未见很好的融合,反而随着清代皖南经学和桐城文学的兴起,有进一步拉

① 皖北、皖南、皖中在不同时期因道区设置不同而各有所指,其中以皖中概念形成最晚且最为模糊。民国北洋时期,皖中内部又有怀宁和桐城之分。怀宁、桐城一为省会,一为文化昌盛之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皖中概念的隐而不彰。故时人又有皖北、皖南、怀宁、桐城并提之说。

② 古代确定政区分界常常会考虑地理、文化等方面因素,所谓“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但对中央集权制而言,这样的分划却有一个很大弊端,“那就是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足够大,而政区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因而自秦代开始,统治者便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犬牙相入的原则与之相抗衡。到了元代,这一原则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部分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域完全背离。参见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第113—1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230—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葛剑雄:《大一统政区划分的两难》,《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

③ 谭其骧和周振鹤都认为,清初江南省纵向一分为二,实有深层考虑,这样做是为了使富裕的江南和稍次的江北,以及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的淮北能够肥瘠搭配,以免省与省之间相差过大。参见谭其骧:《长水集续编》,第52—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246—248页;周振鹤:《学腊一十九》,第134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但将差异很大的三个地区划归一省实不利于统一规划和内部整合。相似的例子还有陕西。参见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版。

大之势。不断扩大的区域差异直接导致了区域意识的兴起，^①并使得日后教育界皖北、皖南等地缘集团的形成成为可能。

除了省内区域的明显差异，省级以下的政区分划对区域意识的培育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当这种区划与经济区、文化区和自然地理区相互重合之时，作用就更加明显。

清代安徽道的设置基本上遵循了与经济、文化、自然地理区相一致的原则，因此很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关注。^②道在明清两代本是布按两司驻扎地方的分支机构，道员也只是临时性的差使，时设时去，衔额无定，但乾隆以后道逐渐演化成固定的府以上省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③清代安徽道设置稳定始于雍正年间，当时共有庐凤颖和安徽宁池太广两道，分领安徽的八府五直隶州。安徽宁池太广道除安庆府位于长江以

① 民国时期的废省存道和缩省运动，除了分划省区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实不能忽视省内自然、经济、文化差异过大导致的区域意识的勃兴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参见张学继：《民国时期的缩省运动》，《二十一世纪》1994年10月号；杨树毅：《废省说》，《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沈同芳：《江苏省分合问题与升道为省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内政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李琴：《试析民初分省论争》，《贵州文史丛刊》2005年第4期；李巨澜：《辛亥时期“江北分省”问题探略》，《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周振鹤等学者已经注意到府、州等统县政区对区内文化整合、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参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55—6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振鹤等：《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第43—4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第190，218—21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第368—369页。但对道，尤其是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上升为统县政区的道，重视却稍嫌不足。其实晚清和民国时期，道的设置多与省内地理、经济、文化大区相互重合，在省级舞台上，区域间的对抗许多也都是道与道的冲突。美国学者 R. Keith Schoppa 就曾发现，道在二十世纪早期浙江精英集团聚集和对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澄滤俱乐部（1918）和良社（1919）的竞争，前者联合了金衢严道、温处道和宁绍台道中的台州精英，后者则聚集了杭嘉湖道和宁绍台道中的宁波、绍兴精英。至于宁绍台道的分裂，既与区内经济、文化差异未能很好融合有关（宁波、绍兴经济、文化较为发达，与杭嘉湖道联系更为紧密），也离不开屈映光的个人因素（屈为台州人，1913—1916年担任浙江最高行政长官，在省级政治舞台培育了台州帮。台州政治势力的不断壮大，使其与政治核心区域的杭嘉湖道和宁波、绍兴精英形成了尖锐对抗）。不过从总体上看，精英集团对道的认同仍然十分明显。这在自然、经济、文化较为一致的金衢严道和杭嘉湖道表现的就更为突出。参见 R. Keith Schoppa,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68—174。

③ 参见李国祁：《明清两代地方行政制度中道的功能及其演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期（上册）；刘子杨：《清代地方官制考》，第94—9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版。

北，其余四府一州全部位于长江以南，经济和文化上与庐凤颍道均有很大差异，由此也奠定了皖北、皖南之分。同治年间，增设安庐滁和道，原庐凤颍道改称凤颍六泗道，安徽宁池太广道改称徽宁池太广道。三道自北向南横分安徽为三部，皖北、皖中、皖南三分格局由此而成。光绪三十四年，三道均遭废置，新设皖北、皖南两道，辖区分别与原庐凤颍道和安徽宁池太广道同。民初废府存道，设淮泗、安庆、芜湖三道，道名虽改，但道区对应前清凤颍六泗道、安庐滁和道、徽宁池太广道，并没发生大的更动。^①

综观以上二百年安徽道制变化，可以发现道区设置基本稳定，而且与自然、经济、文化区长期吻合，这使得因自然、经济、文化差别导致的区域意识逐渐提升为道区意识。民国以后，由于府州被废，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统县政区，^② 这种道区意识有进一步强化之势。道区意识的强化直接孕育了教育界皖北、皖南等以道区认同为基础的地缘集团。^③

台湾学者张茂桂在分析族群意识发展时指出：群体意识要能够发展，并且成为集体行动的基础，其成员首先必须具有群体的认同感，但仅有群体的认同感，而没有对群体特殊利益的认识，这样的群体认同只是一个“空洞的象征”。^④ 同样，对于道区意识而言，仅有道区认同，而没有对道区特殊利益的体认，这样的道区认同也不可能产生皖北、皖南等以捍卫道区利益为特征的地缘集团（捍卫道区的利益与维护道区成员的利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科举制下，州县均有固定学额，分配相对均衡，道区无所谓特殊利益的体认，因而教育界皖北、皖南等地缘集团的产生也就缺乏基本的动力。不过，这一状况随着晚清兴学开始发生改变。1901年以后，安徽新式学堂相继创办，但分布极不均匀，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全部集中于省会，怀宁、桐城等地绅士持其文化优势和近水楼台之便，又逐渐操纵和控制了这些新式教育机构。

① 安徽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建制沿革志》，第396—397，413页，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版。

② 乾隆以后，道虽然逐渐朝固定的地方行政单位演化，并在实际中承担了一级政府的职能，《清史稿》中也列有道员，但《地理志》中却无道这一级区划，可见有清一代，道作为正式的政区尚未得到充分认可。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79页。

③ 民国道制被废之前，淮泗、安庆、芜湖三道与地理上的皖北、皖中、皖南实可相互转换。教育界地缘上的皖北、皖南、皖中之分，也可由道区归属的不同加以理解。

④ 张茂桂：《族群关系和国家认同》，第29、37页，台北：业强出版社，1993年版。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尤其是皖南人（怀宁、桐城在晚清属于皖南道，在皖北人眼中他们均被视为皖南人）对省城教育的垄断，引起了皖北人的强烈不满，在道区对抗之中皖北、皖南等地缘集团开始逐渐形成。进入民国，由于省立中学、省立师范经费由省承担，因而在学校设立地点和创办先后上，道区间的争夺更加激烈。在激烈的争夺之中，教育界的地缘集团意识也随之变得更加明确、牢固。

晚清和民国北洋时期，在皖北、皖中、皖南等以道区认同为基础的地缘集团之外，尚有因经济、文化特别发达，一县而成一派者，如怀宁和桐城，其中尤以怀宁表现最为明显。这反映了大集团中的小集团意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安徽教育界地缘派系的复杂。

相对于安徽教育界皖北、皖南等地缘集团的形成，“龙门”、“高等”、“两江”等学系力量的出现比较容易理解。“龙门系”、“高等系”、“两江系”分别指前清安徽优级师范学堂、安徽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出身者。因晚清安徽学生就读以上三校人数众多，毕业之后又大都在安徽供职，因而彼此相互援引，渐成帮派。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共同的学校归属并不必然导致学系组织的发生，教育岗位竞争的加剧以及由此造成的集团利益体认，方是学系产生的直接原因。晚清，由于新式学堂大量兴办，师资相对匮乏，学校学生出路一般比较宽广，因而学系力量发育并不明显。民国以后，尤其五四以后，随着大批学生相继走出校门，教育界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学系力量方才真正成熟。此外，各学系的形成也并不同步。就同学会的发起而论，有的早在1913年就已成立，有的则迟至20年代初方才组建。因而，分析学系的竞争和对抗，必须深入了解具体的历史背景，仔细衡量学系力量对比的大小。

关注安徽教育界的地缘和学缘关系，并不意味着忽略省内教育界精英与旅外皖籍知识分子的互动和沟通。在笔者看来，只有兼顾了以上两个方面，我们才能对安徽教育界有完整的理解。因而在对20年代安徽教育界的梳理中，笔者也尝试着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为什么选择1920—1926这样一个时间段，有必要在这里加以交代。

五四在历史的进程中往往具有分水岭的作用，许多学者对历史的描述中也多以此为界标，但就安徽教育的发展而言，五四的区分作用并不明显。五四期间，安徽各地，尤其是安庆和芜湖，确实有许多学生走上街头集会、抗议、通电，声援京、沪两地的爱国运动，但一阵急风暴雨式的政治义愤宣泄过后，安徽教育界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的改变。